

# 「社會」的形塑與發展： 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的若干思考<sup>\*</sup>

韓承樺<sup>\*\*</sup>

## 摘 要

本文環繞近代中國「社會」領域三種不同的知識實踐，包括「語言、詞彙的描述和概念定義」、「學術體制和場域相應的梳分與再造」、「知識在日常世界的實踐及影響」，分別對應詞彙史和概念史、知識轉型與學科史、知識實踐/支配史三個範疇，回顧近年相關重要論述，期望在勾勒這些研究成果的總體特徵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兩個問題：第一，該如何描寫這三個層面的歷史經驗，進而評估這樣描寫和解釋「社會」領域的特質；第二，通過這三個面向的總合性思考，嘗試考慮以社會科學知識為核心，勾連相關近代中國的人物、歷史事件與學院場域內外重大變化，深化關於十九世紀以來知識轉型的多重理解。事實上，知識為我們建造了一條通往歷史行動者和結構的取徑，研究者應該嘗試探索將知識當作分析歷史現象特定視角的可能做法，而非僅將知識視為透明、中性之客體，僅僅描寫其內涵、觀念，亦或是將其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中考索其內涵、流變。藉著「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取徑，本文嘗試深化當前關於「中國現代知識建構」的理解與想像，並進一步考慮社會科學知識和「社會」領域在中國現代轉型過程中的交織互動。

**關鍵詞：**社會、社會科學、知識史、社會調查、統計

<sup>\*</sup>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數字作為建構世界的工具：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統計知識與數字概念的建立」(MOST 109-2410-H-431-017-MY3)的部分成果。文章撰寫過程中，得有助理王崇怡、楊采蕓、黃佩雯同學悉心搜集相關資料，筆者十分感謝。本文初稿曾於中研院人社中心、史語所發表，感謝會議評論人林文凱教授與陳建守教授提示部分缺漏。筆者並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予寶貴意見；然一切文責均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2年6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15日。

<sup>\*\*</sup>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 言

在中國歷史的經驗層累裡，是否有可用西方“society”來概括描述、解釋的「社會」。這既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世界的政治問題。早自 1980、1990 年代，西方漢學研究就環繞著「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於傳統中國歷史脈絡的多項議題展開探索，也引發程度不小的論辯。<sup>1</sup>這些論爭揭示了西方歷史經驗普世性與中國歷史脈絡特殊性的問題。自 1990 年代後，論者逐漸擺脫歐洲中心論，以求更貼近中國經驗來探索國家現代化的特徵。如朱英指出，應嘗試從「國家與社會」脈絡來理解晚近在中國各地生成的各種公共性力量，擺脫早期認為兩者二元對立、競爭的觀點，逐漸轉為彼此交融、互動的看法，同時將眼光移往非商業都市的農村、地方社會。<sup>2</sup>更有研究者意識到，國家力量通過制度設計、政策施行下達至地方時，必定會遇到各種社群組織交織而成的網絡，與國家體制和經濟流動網絡疊合在一起；可以這麼說，地方社會力量足以由下而上，從細微處改變甚而重構國家體制。<sup>3</sup>

從地方社群組織思考國家運作的視野，意謂研究者得更細緻爬梳「中國社會」實然的歷史經驗。Michael Tsin 在 2009 年一篇回顧「國家與社會」論文提到概念化「社會領域」（Conceptualizing the Social Realm）的問題，論及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循物質和符號織就「權力」在地方運作的「文化網絡」（a cultural nexus of power），以及沿各種群體、組織或社團所結成的「網

<sup>1</sup> 早期關於「公共領域」、「市民社會」之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討論可見：Symposium: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III. *Modern China*, 19:2 (Apr. 1993).

<sup>2</sup> 朱英，〈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4 期，頁 176-185。

<sup>3</sup> 這部分以歷史人類學者的研究成果見長。程美寶，《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北京：中華書局，2019）；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鐘逸明譯，李仁淵審訂，《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相關研究繁多，此處不贅舉。

絡」(networks)運作形式和特質，作為理解和政治領域相互交織之「社會領域」的關鍵機制。<sup>4</sup>然而，「社會領域」的歷史經驗不僅侷限於權力在政治和地方範圍運作之機制和影響，研究者其實還得考量哲學和政治理想兩個領域。由此而論，過往多集中在社會部門型態、運作機制和特點的描述和評估，較少談及哲學和政治理想的領域。<sup>5</sup>回到「社會」的英文語境“society”，這個西方現代性概念是歐陸世界經歷十八世紀幾次劇烈政治革命，逐漸發展出關於國家內部秩序、社群連帶的安排和規劃，乃至於國家汲取與動員人民、經濟資源的合理方法及制度；而這種特定方法則需要某種專門知識，通過反覆論證和思辨以證成合適、合法與合理性。這都反映時人對政治秩序與國家型態的描述、想像和思考，已逐漸轉用另種語言、概念和知識工具。同樣的，「社會」本就是一個晚近才傳入中國的新名詞，要引起實然行爲、思想與價值層面的變化，也得待至中國人開始接觸並運用，才可能展開這段歷史過程。這樣來看，當我們在反省如何避免過度套用現代社會科學語彙去後設理解中國歷史的同時，環繞著「社會」(society)這個自西方輸入的現代新概念，從語詞、概念和知識層面著手，順時追索更複雜的歷史經驗，或有其必要性。

這件工作，筆者認為可以從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史線索著手，這也是本文措意之處。本文假定社會科學知識與「社會」領域誕生的關係緊密相連。也就是說，自近代以來人們開始在既有經驗基礎上，嘗試思考和規劃「中國社會」的活動範疇、組織結構與生活型態；這過程和西方「社會」相關知識傳入造成的經驗交換、影響甚或衝突，密切相關。社會理論和歷史社會學者 Björn Wittrock、Johan Heilbron 和 Lars Magnusson 指出，十八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在西方世界的誕生，意謂著歐洲知識結構大幅度轉型，既有的「自然法」

<sup>4</sup> Michael Tsin, “Rethinking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Jens Damm and Mechthild Leutner, eds., *China Networks, Berliner China-Hefte/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35 (2009), pp. 24-30.

<sup>5</sup> 這裡的哲學領域、政治理想、社會部門與活動的區分，是參考黃克武關於「公」概念的區別，請參見：黃克武，〈引言〉，收入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viii-ix。

(natural law) 與「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逐漸被人類學、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取代，帶來一系列的新興術語及概念轉化。這也與歐美大陸自十八世紀伊始，接連經歷政治、社會秩序劇烈震盪，以及學院體制、規範與知識實踐形式的變動，交織在一起。<sup>6</sup>人們嘗試理解如何去控制政府以外的秩序，現代學院機構也陸續生成涉及各個面向的專業學科。西方國家走過的路，說明了循社會科學各項知識在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線索，應可看見外部環境產生的變化，進而把握核心術語與概念——「社會」——實際內涵與特色。這既是中國和西方現代性相遇後，在語彙、概念、知識結構、環境及實踐面向形成的豐富成果，亦具體而微地反映了近代東亞區域愈趨頻繁之交流互動所引致的歷史變遷過程。

本文的知識史研究，乃是針對論者所謂歷史場景裡的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將知識視為在特定時空脈絡的斷言和主張，是一種歷史性行動而非永恆真理的狀態。<sup>7</sup>於此，社會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形成及促成「社會」領域誕生的歷史過程，也是環繞著某種特定狀態的肯認和宣稱，被時人廣泛議述、接納甚而相信。基於歐洲史關於知識轉型與實然經驗變遷的例子，筆者也想從此角度來思考近代中國走過的歷程。惟本文並非實證研究，而是回顧既有成果以構思未來可行取徑的研究討論。這般想法必須結合知識史研究視野，借採西方經驗為經緯，劃分出三種環繞著近代中國「社會」的知識實踐/歷史性行動，包括「語言、詞彙的描述和概念定義」、「學術體制和場域相應的梳分與再造」、「知識在日常世界的實踐及影響」，分別對應詞彙史和概念史、知識轉型與學科史、知識實踐/支配史三個研究領域，以說明「社會」領域之形塑和發展是在這三種抽象及具象經驗交織互動下展開。

<sup>6</sup> Björn Wittrock, Johan Heilbron, and Lars Magnuss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p. 1-3.

<sup>7</sup> Helge Jordheim and David Gary Shaw,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Dec., 2020), p. 18. 本期為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專號，集中思考當前史學研究正在經歷所謂「知識轉向」(knowledge turn)問題。

本文根據這三塊研究領域，回顧近年相關重要著述，期望在勾勒這些成果總體特徵之基礎上，進一步考慮兩個問題。第一，該如何描寫這三個層面的歷史經驗，進而評估這樣後設理解「社會」領域的特質。第二，思考如何以社會科學知識為核心，勾連相關近代中國的人物、歷史事件與學院場域內外重大變化，深化關於十九世紀以來知識轉型的多重理解。德國社會、文化史家 Simone Lässig 指出，知識為我們建造了一條通往歷史行動者和結構的取徑；<sup>8</sup>研究者應該嘗試探索將知識當作分析歷史現象特定視角的可能做法，而非僅將知識視為透明、中性之客體，描寫其內涵與觀念。<sup>9</sup>最終，筆者希冀藉著思考這種「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取徑，得以深化當前關於「中國現代知識建構」的理解與想像。

## 二、詞彙史和概念史：從“society”到「社會」

知識轉型伴隨一系列核心語彙和概念的變遷，形塑人們描述、認知和定義日常世界的新方式；“society”與「社會」在近代歐、亞大陸的歷史就是如此。根據 Peter Wagner 所論，十八世紀經歷美、法革命洗禮的西方世界，傳統討論人類自然本性、行為問題的政治哲學詞彙和論述方式，轉為以“society”為核心的科學語彙和論述，關切群體組織關係，專究個人在結構中的行為如何維持「確定性」（certainty），並掌控個人在不同階層和情境下行動所產生的「偶然性」（contingency），繼而創建一套能穩定現實秩序的原理。<sup>10</sup>中國經驗和歐美不同。中國是通過多國文化交流實踐來引入大量詞彙的流通和交換，以觸

<sup>8</sup> Simone Lässig,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vol. 59 (Fal. 2016), p. 32.

<sup>9</sup> 此處說法乃來自於知識史研究對知識社會學、科學史的影響和反省，相關討論請見：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 K.; Malden, M. A.: Polity Press, 2016), pp. 10-14.

<sup>10</sup> Peter Wagner, “Certainty and Order, Liberty and Contingency: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as Empir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pp. 241-263.

發語言、概念的變遷。再者，與歐洲大陸植根於自身思想傳統基礎上的變化不同，中國乃是經歷外來思想資源引致內部傳統文化的改變。以「社會」來說，這段從“society”到「社會」的歷程，得跨越英語、日語，經過語言轉換及翻譯工作才於漢語世界落定，繼而得以在多數人企求大幅度改變現狀的政治文化氛圍中，以言行事。特別的是，英文語境中的“society”是「後革命時代的產物」（postrevolutionary discovery），<sup>11</sup>而中文世界的「社會」，則可被視為推動現代中國革命的關鍵詞彙。

從“society”到「社會」，翻譯活動不只轉換了語言，更形同於創造新容器，導入嵌藏於詞彙裡不同時間層（layers of temporality）之歷史經驗，形塑新概念。<sup>12</sup>這使得翻譯史、詞彙史和概念史取徑在此論題上益顯重要。要言之，這些通過「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建構的新名詞，通過概念結構重組及轉化，如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所指出，是疊合了「經驗的空間」（space of experience）與「期望的視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兩種對應「過去」和「未來」的時間經驗，並指向當前語言使用者之需求的混合物。<sup>13</sup>研究者必須循共時性（synchronic）和歷時性（diachronic）視野，考察概念在時間流中的意義轉化，及其在特定時空脈絡、語境下展顯的總體特徵，才得以理解「社會」在十九世紀中國語境展現的，混雜了傳統文化元素邁向現代性的各種徵象。

從詞彙、概念史角度來檢視，「社會」的誕生是伴隨著傳統語彙「群」在晚清語境的興衰起落，凸顯「如何重塑中國內部組織結構」是近代以降的關鍵

---

<sup>11</sup> Björn Wittrock, Johan Heilbron, and Lars Magnuss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p. 22.

<sup>12</sup> 關於「時間層」問題，本文參閱：Timo Juhani Pankakoski, “From Historical Structures to Temporal Layers: Hans Freyer and Conceptu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9:1 (Mar., 2020), pp. 61-91.

<sup>13</sup> Reinhart Koselleck, “‘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in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8.

思想課題，也是研究者探索「從“society”到『社會』」的核心關懷。這與近代日本的情況相近。明治時期的日本知識人也環繞著“society” / 「社會」，展開語言、概念以及知識實踐的多樣探索。早前如齋藤毅、柳父章的研究，多指出當時“society”譯詞的多樣、不穩定性；晚近木村直惠的研究，則從語詞拓展到思想面向。木村描寫了知識人和“society”相遇，在未能形成「社會」完整概念時期的翻譯與思想問題。如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譯為「世間」、「人世交際」，西周（Nishi Amane, 1829-1897）以「相生養之道」來翻譯。這些複數、不固定的譯詞，反映譯者想像近代人際往來、關係結成之原理的各種嘗試。木村還指出，創辦明六社，創造一個以集體討論形塑學術、政治意見的社群，這種人際往來的新型態，是知識人集會結「社」（society）的首次行動。最終，「社會」於 1875 年生成和確立，是透過當時大量流通於報章雜誌上的相關言說，形成人們描述特定階層或群體，並隱隱然可與政府權力抗衡，近似公共領域的概念 / 實體領域。<sup>14</sup>

當“society”成為中國知識人構思「群」與「群學」的思想養分，環繞著人際關係的想像和實踐，更多是指向民族團結與國家建構這一首要目標。此即關涉到近代「合群」思潮的問題。研究者特別關注知識分子的翻譯策略、詞彙、文本與思想，形成第一個受注意的問題：知識人以何種中、西學資源來思考和論述「如何重造國家組織」？個別知識人的理解和偏重又是什麼？這些研究勾

<sup>14</sup> 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卷 2，頁 131-145。木村有一系列相關研究，請見：木村直惠，〈《society》と出会う——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をめぐる歴史研究序説〉，《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9（2007 年 3 月），頁 1-31、〈《society》を想像する——幕末維新时期洋学者たちと「社会」概念〉，《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1（2009 年 3 月），頁 1-53、〈明六社「ソサイチー」・社交・アソシエーション実践：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の歴史的考察（前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5（2013 年 3 月），頁 1-33、〈〈ソサエチー〉を結ぶ：明六社「ソサイチー」・社交・アソシエーション実践（後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6（2014 年 3 月），頁 1-37、〈《社会》が生まれ、〈ソサエチー〉が消える：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と公共圏の構造（前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9（2017 年 3 月），頁 53-78、〈〈社会〉が生まれ、〈ソサエチー〉が消える：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と公共圏の構造（中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20（2018 年 3 月），頁 29-60。筆者感謝審查人提示相關研究資料。

勒出，從梁啓超（1873-1929）、康有爲（1858-1927）究心於群學、合群思潮開始，到嚴復（1854-1921）確立以「群學」概念轉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sociology”，使得西方社會學仿佛成爲時人譯述團結群體的唯一知識、準則。晚清知識人企圖從古典思想體系中召喚荀子「群」的概念來重造中國，但是，舉凡嚴復、梁啓超、章太炎（1869-1936）筆下的「群學」，都不是純粹傳統思想的復興；這些知識人迴向古典的同時，還融入了跨海汲取的「社會」概念與社會學知識。<sup>15</sup>從概念史角度論，這部分研究展現了從共時性角度考察「群」和「社會」在晚清語境內的互動和競爭。

「群」和「社會」的競爭，最終由後者勝出，成爲“society”的翻譯詞。這個歷時性的關鍵變化遂成爲第二個課題，涵括兩個子題：第一，推動新舊詞語轉換、取代的思想性因素與非思想性因素爲何？第二，由舊到新概念結構和內涵的轉變如何展開？是連續性還是非連續性的變化？金觀濤和劉青峰運用龐大資料庫和數位人文技術得出的歷史圖像，是晚近研究者回答上述論題的基礎。二人指出，1903年是「社會」取代「群」的關鍵轉換期，此後，「社會」的使用頻率就長期領先「群」，被廣泛用來指稱某種具組織結構的生活型態。<sup>16</sup>兩人的論據爲資料庫收藏的大量近現代期刊、報紙，也就是說，「社會」確實相當普遍地出現在各種期刊雜誌的多元論述裡。這也意謂著，晚清以來越趨繁盛興旺的新型媒體，就是推動新名詞傳布的非思想性因素。<sup>17</sup>

<sup>15</sup> 例如，宋學勤，〈梁啓超與社會學〉，《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頁95-101；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肆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爲例〉，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11-177。承紅磊，〈康有爲與「社會」一詞的再使用〉，《東亞觀念史集刊》，期7（2014年12月），頁299-326。筆者撰寫本文之際，未得參閱承氏2023年新出版的《「社會」的發現：晚清民初「社會」概念研究》，謹先記錄於此。

<sup>16</sup>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190-191。

<sup>17</sup> 木村直惠也點出新聞媒體的傳播作用。木村直惠，〈「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2，頁142-144。

當然，語詞變化的思想或其他因素仍值得關注。金、劉二人分別描繪了社會史和思想史的面向。社會史部分是指詞彙的漸布流傳，如「勞動社會」、「軍人社會」、「工商社會」、「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這類描述語句的頻繁出現，反映時人更加認識和肯定現實世界之差異，並試圖克服它。另有如「社會魂」這類論述，則象徵書寫者以「社會」表達追求平等的意識。兩人又指出，「社會」取代「群」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則表現為一個以士紳階級支撐的「紳士公共空間」形成。在這個新型的思想空間裡，因導入大量西方政治、社會、制度之觀念和語彙，逐漸與傳統儒學一元論意識斷裂，形成「中西二元論意識」以接納「社會」這類現代西方國家的組織型態及制度，儒學傳統則退居於私人領域。<sup>18</sup>只是，二位作者卻未清楚說明這樣的二元論式是否真能成立？至少，嚴復、梁啟超、章太炎這些「社會」/「群」的使用及討論者，在建構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從未放棄「群」那種傳統理想的自然狀態。<sup>19</sup>

同樣嘗試尋找思想性因素者，還有馮凱（Kai Vogelsang）循概念史取徑以釐清「社會」興起的概念結構、內涵問題。馮氏更強化新舊交替的轉折，指出正因為「四民社會」結構的崩解，引致舊概念秩序的瓦解，賦予「社會」論述興起的空間。馮氏指出，十九世紀後半，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的困境，嘗試將荀子的「群」重新概念化，打造為凝聚共識和追求國族團結之烏托邦的概念工具。馮凱認為「群」是汲取自經典的政治語彙，呈現傳統中國較理想的組織型態。他和金、劉皆同意，「群」、「合群」、「群學」這系列詞彙的流行，意謂著知識分子試圖打通中國社會分層、階序差異現象，創造團結全國上下的理想狀態。然而，隨著轉型加速，中國逐漸如近代西方國家面臨社會內部因經濟與勞

<sup>18</sup>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 175-220。

<sup>19</sup> 金、劉的研究預設了中國思想觀念是在「儒學一元論」的意識形態下轉型，繼而通過觀念史的做法來撰寫一種近似大寫思想史的圖景。只是，這種二元論式圖景是否真的成立？還有待討論。請見拙論：韓承樞，〈評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新史學》，卷 24 期 4（2013 年 12 月），頁 209-211。

動分工所產生的階層分化，加上劇烈革命破壞了原有政治秩序及控制力。這時，反映在語言層面的變化，即是「群」逐漸讓位給「社會」。馮凱分析當時的「社會」論述後指出，此一詞彙最重要的功能是讓使用者重新概念化以描述現實世界各種分層、不平等的現象。這些論述呈現的總體特徵，則反映部分人開始認識並嘗試描寫一個不同於自然狀態，而能真實呈現差異和不平等現象的現代社群組織，接近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以「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概念所描摹的「實體」（entity）。<sup>20</sup>

上述論點皆是將「群」和「社會」視為新舊截然不同的語詞，具備相異的概念結構和內涵，由此解釋語詞轉變背後的社會、思想脈絡。從這點來看，當人們轉用「社會」來描述現代民族國家內部的實然／應然型態，並舉引社會學或廣泛社會科學為達成此一目標的知識工具，就益加顯得「群」和「群學」無法處理中國基層組織愈趨分化、彼此衝突的現象。「社會」／「社會學」、「群」／「群學」的轉換，從研究者視角看來如此判然二分；然而，如果順著歷史時間的視野來看，就得審慎考慮此種二分法成立的可能。也就是說，這個先後取代的現象及思想因素是否真能完全成立？筆者認為，以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材料來看，人們對語彙的選擇和使用還比較含混，不時有用「群」來理解「社會」的狀況。或許應該嘗試將「群」和「社會」及一系列相關詞彙並置於同一場域，考察兩者概念差異和可能相互流通的狀況，及其建構了何種「如何重造國家組織」的複雜論述。

筆者肯定金、劉二人與馮凱的觀點，新詞彙的流行確實代表中國基層組織遭遇大幅度變動；「群」和「社會」的競爭，也說明時人對歷史經驗之掌握及關於未來的期望。但筆者想指出的是，這兩個詞彙交互出現於文本中，彼此涵義交互影響的情況，實頗為常見。譬如嚴復於 1895 年發表的〈原強〉，很明顯是從荀子「能群」的思想語境，說明「相生相養」、「易事通功」這些社群性事務，均屬於斯賓塞群學／社會學；其更關涉「一國盛衰強弱」、「民德淳

<sup>20</sup> 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 2，頁 95-130。

漓翕散」之由。<sup>21</sup>說明當時的知識人是在部分瞭解社會學前提下選擇以「群」來翻譯“society”。又如麥孟華（1875-1915）曾這樣解釋：「西士之言群學也，凡合多數之人而成爲社會者，必其協力分勞，各盡職分，互相聯合，互相扶植，然後其群乃成，其國乃立。」<sup>22</sup>麥氏呈現了以「社會」意指多人集合狀態，這裡面得建立合理的分工秩序，以建構理想的「群」乃至於國家；此即爲西國所言「群學」。交替使用「群」和「社會」的例子，表達了消弭紛爭保全群體的理想。像有資料提及，在當前這個「人與人爭之大社會」時代，得以「推原人群發達」之「群學」消弭社群內部因「分」所生之各類衝突，達成「保種存國」的目標。<sup>23</sup>筆者認爲，這些例子提醒研究者應進一步斟酌，在詞彙、概念轉換的共時空間裡，人們面對基層組織結構變遷的複雜問題時，在尋找一套形塑中國人群共同體之原理法則——亦即上舉事例中的群學——部分人其實仍是依循傳統經典中「合群」、「能群」的觀念來思考，在古典理想與未來期望間擺盪，甚至希冀摸索出結合兩者的折衷辦法。

筆者嘗試以「複合式語言」來描述新舊詞彙混雜的情形，也就是說，即便「社會」在 1903 年超越「群」成爲普遍用語，但不少文本裡的「社會」、「社會學」，仍保有「群」與「群學」的內涵。在宣傳民族革命的雜誌《洞庭波》曾刊載一篇〈二十世紀之湖南〉，提及湖南人缺乏「合群性」的問題。文中指出，這種「群治主義」是西洋所謂「群學」，日本人稱爲「社會學」，是培養公共道德的學問。湖南人必須培養「尙群」心以養成「愛同種之心」，並推廣至其他省分以團結中國。<sup>24</sup>另在《浙江潮》上一篇連載小說〈愛之花〉，作者開頭表示自己平日喜研究「社會學」，因其有「統制群治」之效，是晚清國人欲從事諸種改革應取法之源頭。<sup>25</sup>結合上引例子來看，當時人確實注意「社會」

<sup>21</sup> 嚴復，〈原強〉，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1，頁 6。

<sup>22</sup> 先憂子（麥孟華），〈國民公義（續前稿）〉，《清議報》，冊 48（1900），頁 1b。

<sup>23</sup> 〈擬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敘例〉，《清議報》，冊 34（1900），頁 1b。這份資料出於梁啟超創立的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講義錄，有可能反映了他的部分思想。

<sup>24</sup> 鐵郎（陳家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期 1（1906），頁 5-6。

<sup>25</sup> 儂更有情，〈愛之花〉，《浙江潮》，期 6（1903），頁 1-2。

象徵的群體分歧特徵，但在構思如何尋找並運用一種有效重塑中國社群組織結構的理法時，「群學」就會成為論述主軸。也就是說，在「社會」概念通過文化翻譯和論述逐漸成形的過程中，傳統社群理想之「群」的「經驗的空間」就疊合入新概念結構裡；這導致了傳統政治思想中的「搏成理想群體」，仍可能是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人考慮的核心問題。<sup>26</sup>當然，「複合式語言」的想法不能完全釐清語詞轉換時期的現象和問題，但筆者認為，史學研究也並非僅在描繪一幅由 A 點到 B 點二分走向的圖景。

綜觀近代中國「社會」的概念史，研究者多半聚焦於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語詞轉換期，忽略兩個值得注意的時段問題。第一，概念前史的課題。專研十八世紀法國史的 Keith Baker 追索語源歷史，在十七世紀各種辭典中找到已有與“society”相關聯的詞彙被用作描述舊政權時期集體生活經驗，大概有三種定義：人類為回應彼此需求而互相結成；人類群集形成的自然組織；表示一種集體秩序的結合。Baker 更認為，“society”於十八世紀啓蒙時代產生的概念變遷，實是由十七世紀在認識論、倫理、宗教與政治四個層面因懷疑論（skepticism）觸發之價值危機所致。這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在失卻神性僅存人性行爲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重造共通人性的群體？這個疑問由十八世紀啓蒙哲士承接，繼而思考社會契約抑或人類自主結社的課題。<sup>27</sup>Baker 的研究提醒我們得考慮：在尚未出現「社會」的時代，如在明清文獻裡，人們如何思考和描述個人行爲、群體組織、國家結構三者交織互動的議題？晚清因「群」和「社會」揭示的國家結構變遷問題，是否與明清思想中環繞著公、私領域經驗轉變有思想關聯？這個概念變遷與既有經驗異動的課題，是否不僅發生在二十世紀，明清時期的狀況亦值得追索。

<sup>26</sup> 這部分的討論，詳見拙作，〈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3（2017 年 12 月），頁 365-380。

<sup>27</sup> Keith Michael Bak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Notes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pp. 95-120.

第二，是現代概念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識形態化（the increasing susceptibility of concepts to the abstraction from their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ferent）、政治化（politicization）問題。研究者應該拉長歷時觀察視野，考索「社會」在二十世紀中國語境的傳布和使用狀況，觀察概念如何跨越不同社會階層而被廣泛接受、運用，更進而轉為帶有特定政治意涵的口號，成為形塑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出現於各類論戰。<sup>28</sup>筆者認為，「社會」概念的民主化、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或許得等到 1920、1930 年代，以「社會」為核心的知識體系建制，並展開大規模、系統性的調查研究，進而形成相異理解引致大規模論辯，才算真正完成。屆時，「中國社會」就不再只是晚清知識分子投射未來期望的對象，它不僅被當作一個實證、經驗性研究的實體，更成為各方知識人、政治人物的論述武器。結合這兩個問題，或許更有利於後進研究者以「社會」為詞彙、概念史個案，考慮東亞思想、概念轉型，甚至思考近代中國是否有類似「鞍型期」（saddle period）的思想特徵。

### 三、知識轉型和學科史：社會學的誕生和建制

在專業學科劃分、形成「社會」類屬知識前，近代歐洲的知識體系是環繞著「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討論人口、經濟、國家、身體問題，且與宗教、政治、道德密切相關。<sup>29</sup>Björn Wittrock、Johan Heilbron 和 Lars Magnusson

<sup>28</sup> 如李恭忠的研究仍聚焦在近代早期，他認為語詞概念的「四個化」，特別是「政治化」在晚清時期即已出現、定型。筆者認為還有待進一步界定「政治化」概念的內涵和定義。李恭忠，〈近代中國「社會」概念的早期生成〉，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卷 7，頁 86-87。現代概念「四化」和鞍型期是概念史家柯塞雷克的論點，筆者此處是參酌方維規的討論與陳建守的中文翻譯。請參見：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2011 年 12 月），頁 85-116；陳建守，〈作為方法的概念：英語世界概念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193。

<sup>29</sup> 「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的觀點引自 Porter 這段討論：Theodore M. Porter, “Genres and Objects of Social Inqui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1890,”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16.

指出，從「人的科學」轉往「社會的科學」，象徵十九世紀以來，人們關注焦點逐漸從個體、心靈移往名為「社會」的新興場域，以探詢市場經濟活動、國家政治活動、社會內部關係聚合，這三個自然形成且互有區別的問題範疇（a “natural” tri-partite divis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market,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aggregat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society”）。<sup>30</sup>它們催生了新興學科，其共同目標就是試圖理解革命事件帶來的不穩定和偶然性（contingency），繼而探索國家內部的秩序和穩定。在歐美現代大學裡建立專業分科體制，是社會科學知識取得關鍵進展的標誌；這也導致「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成為研究者描寫和評估這段知識史的基礎框架。十九至二十世紀，專業學科確實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立足於世界的顯著象徵，但這並不代表知識學科化（disciplining）的過程就單純是人類智慧、理性積累與發展的結果。社會科學史家 Dorothy Ross 指出，學科形成其實更像是段非透明的構劃（project）過程，必須充分考量過程中的歷史偶然性。<sup>31</sup>如今，研究者慣常將專業知識生產體制與過程，置於思想、論述、行動者、權力以及各種內外因素交織的複雜網絡中，以脈絡化視角結合「社會性」（social nature）因素，重新編織複線的知識史。<sup>32</sup>此致，社會科學各類知識從十九世紀開始的

---

<sup>30</sup> Björn Wittrock, Johan Heilbron, and Lars Magnuss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p. 21.

<sup>31</sup> Dorothy Ross,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p. 206. 亦可參考：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譯，《學科·知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以及從思想史研究角度對學科史作的反省：Suzanne Marchand, “Ha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Had its Da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1-152.

<sup>32</sup> 以社會科學史研究為例，以下這幾本著作都是從歷史學的脈絡化視野描述學科專業化過程中攸關知識內涵和學科體系的轉變與發展：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Ols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642-1792*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Mary O. Furner, *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相關研究成果繁多，本文不贅列於此。

學科化工程，不再被視作白色巨塔內的事業，更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交互影響下的個別、偶然事件匯聚而成。

本文無法詳述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史的相關研究，舉凡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 / 民族學、心理學，都已累積不少科際內部者的著述，亦有不少專研近、現代思想、學術史者投入。此處就循前段提及市場經濟、國家政治、社會關係三個問題範疇 (a “natural” tri-pratite division) 裡的社會學部分 (亦與本文題旨最相近者)，說明 2000 年以來的學科史研究成果和特點。事實上，中國社會學史的寫作發展很早，多是在中國現代轉型的視野下，將學科建制的歷史過程理解為「西方知識、學術傳播與中國如何接收和再造」的相關問題。這些論著的共通特點就是，用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解釋框架引導研究者描寫和評估學科知識的特點與影響，以考慮知識和國家建構的關聯性。<sup>33</sup>

現代民族國家的解釋框架，強化了學科與國家的連結，更強調學科體系之於中國現代知識發展的必然性。學科作為解釋框架的部分受「西學東漸」問題意識影響很深。它假設中國學科建制過程是在西方現代性移植、影響下展開，繼而建構出一種以學科為框架，依循「西方、中國 / 新、舊」立場，描述中國得加緊腳步才能彌補與西方現代學術機構間巨大落差的知識轉型史。這樣的問題意識雖然可以掌握個別學人、學術機構、團體、研究工作的概況，以此勾勒時序線索，卻也讓「學科」成為研究者判斷歷史經驗的唯一後設標準，容易遺漏學科化前的經驗，造成倒放電影的解釋。更有甚者，現代學科的解釋框架還暗含中國落後於西方國家的想法：某些學科的誕生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象徵，反之，那些溢於體制外的部分就被掃入「前現代知識」分類裡。這更反映

<sup>33</sup> 早期的社會學史寫作，多半帶有如是關懷。李劍華，《社會學史綱》(上海：世界書局，1928)；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收入《孫本文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卷3。這兩本寫於1920、1940年代的學科史就是如此。1980年代左右出產的兩部著作也是同樣情形：韓明漢，《中國社會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楊雅彬，《中國社會學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出章清提及的，中國建立現代知識體系的過程，是環繞著知識的「國別性」差異，繼而遇上「普世性」與「現代性」的問題。<sup>34</sup>

近幾年來，在思想史、概念史、科學史與全球史影響下，「中國現代知識」議題在取徑和視野上取得長足進步，稍可突破民族國家和學科框架的窠臼。這部分共有四個面向：第一，將鑲嵌在「西學東漸」的線性歷史時間預設，轉為「傳統思想、文化的連續與非連續性」以及「全球知識流通與在地再製」兩種非直線的歷史時間。第二，從概念、思想學術傳統與文化實踐的角度，更細緻梳分「西學」的內涵、來源及文化背景，傳播至東亞地區的管道與辦法，以及中國如何在既有思想傳統基礎上接納與轉化西方知識。三、描寫與評估個別學人和學術機構仍是重點，但更注重學術制度、議題與研究工作如何在國際合作或全球知識交流網絡中建成。四、個別學科的知識實踐如何介入並改變現實世界。這大致可區分為科學知識產生的技術，以及以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為基礎所形成的解釋、管理和統治技術，兩種知識實踐如何改變既定認知模式、積累不同經驗以建構新問題範疇。以上四個立場的變化，足可反映近年研究者觀察中國現代知識史的新取徑與成果。<sup>35</sup>

晚近的社會學學科史研究和寫作也大致呼應著這四個動向，較多是第三個立場的成果。這部分主要是在學科史基礎上，細緻呈現知識在脈絡主義視野下的多元樣貌。雖多數仍是由學科內部者撰述的通史性作品，但仍共同勾勒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第一，注意國內與國際因素互動如何打造環繞著「中國社會」問題的社會學。隨著國外檔案的發掘和開放利用，研究者描寫的中國社會學

<sup>34</sup>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三章比較集中處理此議題，頁 192-257；亦請見結語，頁 478-481。

<sup>35</sup> 此處僅舉關涉學科制度、體系，以及地理、歷史、哲學這幾種類型知識的研究。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潘光哲，《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馬亮寬、馬曉雪、劉春強，《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John Makeham, ed, *Lear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現階段已形成以個別學科 / 機構 / 人物為主的討論，相關研究成果繁多，此處不贅舉。

史，是一段自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如何在美國、英國與蘇聯學術傳統影響以及跨國組織資源輸入下，逐步建立學科、機構、社群組織、學術期刊這些現代知識實踐的基礎建設，以及學人如何接受西方學術訓練、交流乃至於論辯，從而開展中國社會學的研究。<sup>36</sup>這其實可明顯見出中國知識體系在二十世紀後的發展腳步，其實是緊承西方路向，甚至於後期能形成刺激和反饋。這讓我們思考，二十世紀以降的知識全球流動，並非單向擴大中、西差距，而很可能是急遽縮短這道鴻溝。而在這般短的時間內大量將西方知識壓縮輸入中國，又會造成何種影響？

第二，在全史視野下，有研究者將知識建制化過程和民國時期「社會問題」聯繫在一起，描述社會學知識和研究，如何被專業知識人用以論述特定議題，如都市化、中國農村、農村經濟和建設、民族識別、人口問題，而這些問題亦掀起不同政治、學術傾向知識社群的論辯。<sup>37</sup>這些研究凸顯出，中國現代社會被知識區辨為幾種不同問題範疇，這些社會問題實則反映了，在傳統統治秩序和治理技術崩解與重建的過程中，群體組織結構、型態和生活方式，會產生各種不穩定與衝突。這些問題在將社會領域按問題範疇分門別類的「部門化」過程中，更強化了學科內部各個次領域的定位、特色與意義。事實上，從當時頭銜為「社會學者」涉入的問題來看，很多是牽涉經濟學、歷史學、民族／人類學三個如今已獨立分科的領地。學人專長互異，卻又對這門學科之現實目標產生高度認同。像林耀華（1910-2000）憶及他在燕大社會系的訓練時指出，吳文藻（1901-1985）刻意引導他們「更注重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而不太在

<sup>36</sup> 社會學史研究成果繁多，惟較多仍是由學科內部者視知識積累、制度化發展為自然進程，以追溯歷史來確立權威之作。晚近要以閻明的著述比較能脈絡化解讀資料，包含當時專業期刊文獻、個人性資料、檔案，描述這門知識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流轉變遷與時代特色。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sup>37</sup> 李培林、孫立平、王銘銘等著，《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社會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Arif Dirlik, Guannan Li, and Hsiao-pei Yen, eds.,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乎學科界線。」然而，這也造成後進學生學習及學科規範建構的困擾。<sup>38</sup>又如費孝通（1910-2005）曾憶述當時「中國的大學裡人類學或民族學這個牌子掛不大出來，所以一直混在社會學系裡。」<sup>39</sup>這些例子說明了，知識學科化並非純由理性主導之智識發展的自然結果，還牽涉時空脈絡下的特定因素，且存有許多模糊、猶疑處。當我們以後設角度來描寫學術分科的歷史過程，就很可能會以當前的角度去判斷歷史事件發展進程，陷入可能的誤解，或錯漏知識變遷的細節。

「學科」是定義現代知識的常見方式，卻也僅是知識史的一種經驗；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學」科際界線浮溢、錯動的現象，顯示了中國知識現代轉型經驗的特殊性。本節回顧近代中國社會學知識的歷史書寫，是想進一步指出，專業學科固然是描寫現代知識的基礎單位，但研究者卻不應該將「分科知識」視為人們理解和企圖改變世界那套思想與實踐方式的唯一型態；大學院校和學術機構，也絕非知識運作的唯一場域。我們應採取 Dorothy Ross 的「歷史主義」取徑（*historicist approach*），肯認知識的結構、疆界、目標和實踐的異動性。即便如社會科學這類學科界線與規範鮮明的知識，也應該被放入更廣闊的文化、思想、政治脈絡來理解。<sup>40</sup>或許，二十世紀中國學科體制創建的歷史過程是這樣：學科界域的打造和跨越是同時並行的；科際界線對學人的知識實踐具有「解放」（*liberating*）和「抑制」（*constraining*）的雙重作用，雖指引其應盡所能觸及領域前沿，卻也可能限縮其跨越的可能。現代中國的知識界線即是在這股雙重作用交織下逐漸形成。<sup>41</sup>研究者應該超越現代學科的範圍，思

<sup>38</sup> 林耀華，《林耀華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59-60。

<sup>39</sup> 費孝通，〈為社會學說幾句話〉，《費孝通全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卷 8（1957-1980），頁 18。

<sup>40</sup> Theodore M. Porter, "Genres and Objects of Social Inqui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1890,"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p. 38.

<sup>41</sup> 這裡的「解放」和「抑制」是借自 Lloyd 討論現代學科界線的可能影響。請見：勞埃德（G. E. R. Lloyd）著，陳恆、洪慶明、屈伯文譯，《形成中的學科：對精英、學問與創新的跨文化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157。

考十九到二十世紀知識社群觸及之思想世界的真實樣貌。在當時學人的視域中，他們可能得在中西、新舊知識交錯、流動的情境下，嘗試摸索出運用這些新興知識來解釋和改變世界的方式。

#### 四、知識支配世界的歷史： 知識如何定義和重構「社會」領域？

文本知識如何介入現實世界？日常生活的知識實踐如何對世界產生實際影響？本節要進一步討論上舉第四個知識史研究立場，以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形構的描述、解釋和治理日常世界的技術，如何在中國現代轉型進程中，打造一個以「社會」為核心的新興領域。這意謂著，在此論域裡生產環繞著「中國社會」的新語言、概念、資訊與知識，是被治理端用以重新定義和劃界出這個名為「社會」的領域，而這層歷史經驗即是在政府施行統治技術和民眾經歷統治力量的複雜互動過程中產生。在研究取徑和方法上，筆者認為可採用日本學界的「學知」概念，即認為支持帝國政府遂行統治行為、專業技術以掌握土地、人民來建構支配關係的知識資源，是跨越或整合科技界線的各類知識，如政治科學、經濟學、人類學、統計學、調查技術……等，它們很可能是以混成的形式作為統治資源。<sup>42</sup>「學知」論點是建立在帝國支配殖民地的問題意識上，與中國現代史脈絡不甚相同，惟此概念仍引導筆者思考「知識如何理解、掌握進而支配社會」的問題，這關係到政府運用哪些特定知識，或整合多種知識、技術來打造統治術，介入到梳理和定義社會領域內部各個部門的複雜歷史過程。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領域如何在社會調查、統計學於二十世紀中國專業建制、發展的歷程中，逐步誕生。

<sup>42</sup> 山室信一，〈日本帝國形成的學知與心性〉，《思想》，期 41（2020 年 11 月），頁 130-132。帝國學知的取徑已產生了豐碩成果，請見八卷冊的《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学知》（東京：岩波書店，2006）。筆者感謝林文凱教授的提示。

「社會」領域被定義、形塑的過程與「個人」是密不可分，這是民國思想史很明顯的變化趨向。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社會」成爲中國政治、時論界關注焦點。對此，楊念群指出兩個相互關涉的問題：第一，「社會」作爲一個論域爲何在五四前後生成，以及如何取代其他思想主題？第二，「社會」如何成爲重新理解「個人」與「國家」在實存、價值和意義上的理想取徑；「社會」、「個人」與「國家」三者關係的重新安排及定位，反映了城市和農村社會結構組織的劇烈變化，迫使人們思考自我在群體內部該如何安置，個人如何與爲何形成與國家的關聯？由此可見，「社會」確實成爲 1920 年代以降的思想主題，它取代流行於晚清的「國家」，轉而作爲能連結大我和小我的主題，成爲其時知識人戮力究心的重要課題。<sup>43</sup>

由此而論，「社會」與「個人」必須交互參看、同觀並照，才可能理解兩個領域重新劃界和定義的過程。近年，一部《中國「人」之科學的建構：歷史與概念基礎》（*The Making of Human Science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論文集，就是討論當「人」被視爲科學知識分析、研究對象時，會產生哪些面向的影響？該書將這段知識轉型觸及的歷史面向分做四部分：第一，知識如何重新界定與概念化人類生活各個範圍（Parameters of Human Life）；第二，知識如何建構「人」作爲現代性主體（Formations of Modern Subject）；第三，關於「人」的分科知識（Disciplining Knowledge）；第四，解碼個人身心健康（Deciphering Health）。以「人」爲核心，四個面向分別描述二十世紀中國人與現代性相遇後，如何經歷在現實生活、個人主體性、身體和心靈的轉變，以及是哪些現代學科知識介入並扭轉了原本理解世界之方式；既有知識架構又在與西學新知接壤和調整過程中，如何重組一套足以科學描述、定義與評估「人」的認知體系。<sup>44</sup>

<sup>43</sup>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 16-35。

<sup>44</sup> Howard Chiang, ed., *The Making of Human Science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9).

該書更說明了，我們無法脫離「社會」而單獨理解「個人」。即如書中討論的經濟學、心理學、統計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政治科學，既是該書定義之「人的科學」，也可歸入社會科學內。這也如「學知」概念，是跨越科際界線且具特定統治目標——人——的知識類型。易言之，所謂現代性個體經驗，其實是在國家與社會領域底下建構與發展。一如該論文集討論的心理學，它是賦予國人重新想像自我（self），以及自我與他人，乃至於社會整體和國家體制關聯的資源和工具。作為心理科學研究對象的「人」，在知識探究和實驗進程中逐漸形塑主體性；這又與現代社會組織建構的步調交織在一起。這部分就和論文集描述現代中國身心健康醫療這塊有關，牽涉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精神病學（Psychiatry）與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這三種現代心理醫學，既是關照個人身心狀態，又和社會安全秩序建造和管理緊密相連。<sup>45</sup>

「個人」與「社會」確實如一對互為參照的科學分析範疇。就像 Wagner 指出的，「社會」（society）是一個在特定時間與認知空間裡表述「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狀態的概念工具，可從「社會關係」轉變的脈絡，解釋自由主義理論中關於「個體」（unity）的政治問題。<sup>46</sup>

結合「個人」與「社會」的範疇，社會調查和統計學也是近年頗受關注的知識實踐。這種「國家的科學」（state sciences），得通過數字將考察對象轉化為可被理解、測量、比較和管理的主體，由此再現特定群體或社會整體運作的律則性特徵，更是足可檢明「社會」存在的實證性資料。<sup>47</sup>而從全球史角度

<sup>45</sup> 除此論文集的第四部分外，還請見王文基和巫毓荃的研究。王文基，〈「當下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新史學》，卷 17 期 1（2006 年 3 月），頁 91-142、〈心理的「下層工作」：《西風》與 1930-1940 年代大眾心理衛生論述〉，《科技、醫療與社會》，期 13（2011 年 10 月），頁 15-88；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sup>46</sup> Peter Wagner, “‘An Entirely New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of Volition, of Thought’: The Coming into Being and (Almost) Passing Away of ‘society’ as a Scientific Object,” in Lorraine Daston, ed.,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156-157.

<sup>47</sup> 「國家的科學」(state sciences)概念出自：Peter Wagner, “‘An Entirely New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of Volition, of Thought’: The Coming into Being and (Almost) Passing Away of ‘society’ as a Scientific Object,” in Lorraine Daston, ed.,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 p. 133. 西方學界較早開社會調查和統計學史的研究，是牽涉政治、社會、思想、文化與跨國事業的複雜課題，此處

看，調查與統計知識更像是帝國殖民他方的資源、工具。十九到二十世紀，西方國家往中國挹注的資源，包括資金、圖書、專業人才培養及輸出，對社會科學知識體制的建構助益良多。中、西雙方都希望能憑藉科學調查和統計，建構關於中國社會的實證理解。在 1950 年代以前，投注最多者就以美國為要。這自然是 Dorothy Ross 指出的，美國「科學的工程學概念」(*engineering conception of science*) 在兩次大戰期間的異地實踐，讓社會科學知識和實踐者成為干預它國社會現代化的實質資源。<sup>48</sup>全球史與知識作為統治技術這兩種角度，引領我們認識中國知識人學習社會科學知識，嘗試探索「中國社會」的歷史場景。在這裡面，人人都像李景漢（1894-1986）和陶孟和（1887-1960），受科學證據匱乏的情緒驅動，想以實證資料向世界證明中國已轉型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sup>49</sup>底下將循這兩種角度來檢視關於社會調查和統計學的相關研究。

首先，關於全球知識網絡的問題，現階段成果是初步釐清現代中國社會調查的知識脈絡、來源，以及這些西方調查手法進入中國後遭遇的反應和挑戰。這主要仰賴幾種整體史寫作，勾勒出社會調查整體發展和成績、幾位重要學者的關鍵作為以及和不同學派的論辯交鋒。這些整體史多半由學科內部者執筆，通過歷史溯源和書寫來確立知識權威之目的，頗為明顯。這些著者追溯調查活

---

僅舉筆者寓目、參考所及：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urine Weiner Greenwald and Margo Anderson, eds., *Pittsburgh Surveye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odore M.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Silvana Patriarca, *Numbers and Nationhood: Writing Statis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J. Adam Tooze,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48</sup> 「科學的工程學」概念與跨國實踐出自：Dorothy Ross,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pp. 219, 227-228.

<sup>49</sup>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影印 1933 年星雲堂書 3 月店版），編 3 冊 17，頁 10。陶屢恭（孟和），〈社會調查〉，《新青年》，卷 4 號 3（1918），頁 221。

動淵源，發掘晚清知識分子通過翻譯文本接觸到西方年鑒類刊物，驚覺數字之於揭露民族國家資訊的重要性。緊接著清末留日學生籌組調查部，累積不少刊布於期刊雜誌上的資料和數字。清政府則於預備立憲時期，意識到調查國家資訊對制度設計及政策頒布的必要性，方始著手推動相關工作，設立各省調查局和統計處，規範調查制度、設計各項調查表格樣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調查活動，就是清末展開的人口（戶口）普查，只可惜材料殘缺，目前無法確切掌握實際執行情況與成果。整體來看，學界對晚清執行調查成果的評價較低，僅凸顯西方年鑒類文本，以及由日本輸入的國勢概念、統計方法論，如何產生可能的影響。<sup>50</sup>

民國以降的社會調查，由於正式引入西方學科知識，以及專業學人回國執教、實際操作調查活動；學界評價整體較高，並特別注意到調查方法論引起的論爭。如李景漢等「社會調查派」與吳文藻（1901-1985）、費孝通（1910-2005）提倡之社區研究法，競爭關於「社會」的研究及詮釋權。這場辯論深刻反映了中國社會學、社會調查知識的發展如何在中西學術交流張力下展開。李章鵬指出，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例，創系開始就以社會調查結合社區服務為要；而社區研究法於後期的倡行，則是在受到芝加哥社會學系的派克（Robert Parker, 1864-1944）和英國功能主義的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 1881-1955）先後訪學之刺激的轉變。吳文藻提倡以深入單點社區調查來分析社會結構功能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為了呼應西方社會學的轉向，二方面也可視為吳文藻為發展專門適應中國社會之理論，以推動社會學中國化的努力。吳、費兩人執「社區研究」大旗試圖和社會調查派爭奪中國社會實然狀態的詮釋權。他們聲稱，社會調查得出的數字只能描述部分社會事實，未形成結構性解釋；而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危機是組織解體，科學研究必須要能對社會行為、態度建立詮釋，才

<sup>50</sup> 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李志英、羅豔、傅弈群，《認知中國：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的人群聚類分析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水延凱主編、江立華副主編，《中國社會調查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0）。

能看到重新建構中國社會的曙光。<sup>51</sup>顯見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活動，幾乎都曾引據異地知識為思想資源，進而形成實證資料和理論詮釋兩種相互競爭的政治、社會論述，這既是知識全球傳播的問題，也凸顯知識在地構作，與地方政治文化、思想因素交織互動的歷程。整體來看，現階段研究多偏重社會調查，較少集中處理社區研究派，像吳文藻、林耀華、費孝通等人如何透過社會學、人類學理論來建立關於中國社會的解釋。研究者可將援引理論建立詮釋的嘗試，視為知識在特定時空情境下的實踐，考索知識與外在環境如何互動，逐步形成特定解釋且獲致公眾信任，進而析論社會學在建構中國社會的作用。

第二種研究角度牽涉到新興知識、技術參與國家、社會建構的過程。早前，江勇振就以「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概念，從「技術專家治國」（technocratic）角度考察民國時期三個重要學術機構、社群的調查活動：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南開經濟研究所、陳翰笙（1897-2004）領導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江氏特別從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跨國援助的脈絡，考索農村問題與重建計畫，以呈現現代中國亟欲建制和發展的社會科學知識，其實很大部分是循中美學術交流網絡供給之資源來建構。<sup>52</sup>

晚近的研究則推進至社會調查如何影響日常的認知範疇、標準，改變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進而推測中國如何憑藉科學技術建立現代治理技術。林東（Tong Lam）的《求實若渴》（*A Passion for Facts*）將二十世紀中國描寫為一個鍛造現代統治技術的實驗室，在逐步強調「科學事實」重要性的基礎上，通過社會調查將國境內每一分子，從人到考古物件都轉化為國家統治力量管轄和動員的現代個體；人變成了公民，考古物件則成了國家文物。然而，該書以近代中國的人口普查為例，嘗試論證從清廷到國民政府兩次調查的正面成果，卻無法尋得確切證據的支持。李章鵬就指出，晚清人口調查史料極為殘缺，相關辦法、章程和細則雖易尋得，調查實況則付之闕如。這讓我們難以推估實際

<sup>51</sup>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頁 308-328。

<sup>52</sup> 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開展的歷史過程以及結果。<sup>53</sup>近期，連玲玲嘗試從性別面向分析近代社會調查，描寫女性一方面是參與調查的行動主體，另一方面又是被科學活動建構為新文化運動進程裡接受他人分析和論證的研究客體。該文揭示了，科學調查所獲致的女性事實，其實是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女性、家庭論述影響，在特定時空環境、思想文化脈絡下產製的性別化「事實」。<sup>54</sup>也就是說，社會調查並非中性的科學活動，而是與權力、社會、性別等因素交織在一起。這些研究揭櫫了，中國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實踐，就是在國家權力自主性與外來勢力的他律性（autonomy/ heteronomy），在應然的科學態度、方法和實然的複雜社會環境的多重張力間，展開民族國家現代化方向的探索。<sup>55</sup>而知識實踐所獲致之「事實」，則得放回到複雜歷史情境中解讀，才可能更靠近歷史事實。

統計學研究史雖少，但仍反映知識全球史以及現代統治技術兩種脈絡。相關著述多以通史視野重建學科知識的歷史場景，少數學人與文本受到特別關注。幾種研究集中討論晚清時期，紐永建（1870-1965）、林卓男（1877-1925）和孟森（1868-1938）陸續翻譯日本人橫山雅南（1861-1943）寫就的《統計通論》，並結合清廷預備立憲的脈絡，觀察政治改革如何打開晚清思想界對統計知識的認識和需求，從而帶動譯介統計知識的風潮。<sup>56</sup>這種新型態的數理知識及衍生形成的資料搜集、管理與推估國家、社會發展模式的特殊技術，確實與

<sup>53</sup>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江勇振指出此書諸多論據失當處。很重要的一點是，林東錯將晚清以降的社會調查活動，描寫成一批受過極為嚴密科學訓練的團隊，調查過程毫無阻滯地獲致確切資訊（事實）。江勇振，〈評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9（2013 年 3 月），頁 173-199。

<sup>54</sup> 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4（2019 年 12 月），頁 69-131。

<sup>55</sup> 「自主性 / 他律性」（autonomy / heteronomy）概念引自：Andrew E. Barshay, “The Sciences of Modernity in a Disparate World,”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p. 408.

<sup>56</sup> 相關研究概如：李惠村、莫日達，《中國統計史》（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馬敏、陸漢文，〈民國時期政府統計工作與統計資料述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6 期，頁 116-129、轉頁 160；王德發，《中華民國統計史（1912-1949）》（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

清末民初政治改革運動和官僚體制轉型，密切相關。如從全球史脈絡論，則可循帝國殖民角度解釋統計學。這種帝國知識的傳入，一方面授予解決問題的鑰匙，卻又不斷提醒中國知識人在世界秩序的落後位階。最早傳入的就屬翻譯文本，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列國歲計政要》這種國情統計類資料，以及登載於《萬國公報》、《知新報》、《時務報》的各類統計紀事。當時如康有為、梁啟超和孫寶瑄（1874-1924），均已明顯認識到統計數字可作為具現民族國家的直接媒介，並通過數字比較來揭露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他們這般認知，是建立在發現中國的調查和統計能力遠落後於英、美現代國家的事實上。<sup>57</sup>近代日本是另一重要知識來源，特別在「社會統計」這塊，而非以機率、概算為基礎的「數理統計」。這部分在白安雅（Andrea Bréard）討論全球視野下中國數字觀念現代轉型的專著裡，較清楚描寫了統計學知識在晚清政治改革背景下，如何引介日本思想資源；並先後在民國、共產中國時期，從注重社會統計的趨勢轉向到注重抽樣調查的數理統計。<sup>58</sup>顯見日本、英國、美國和後期之蘇俄，都積極參與中國統計知識發展歷程。而這批近代知識人迎向統計學的過程，就是在一邊發現自身的非帝國性，一邊極力與域外世界競逐屬於自身「帝國知識」和數字表徵之事實的殖民與反殖民過程。

<sup>57</sup> 車泰根，〈數：帝國的算數和近代世界〉，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 2，頁 237-251。這些被譯介的國情統計資料，部分其實是近代中國首次接受的現代年鑒（Yearbook / almanac）書籍，這一點引起少數專研年鑒學者的注意。但目前也僅就文本內容、譯介出版時間與次數、與統計知識的關聯三點來論，尚未分析這類文本如何可能改變了時人對數字、計量的想法、觀念。如牟國義、沈萌濤，〈《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鑑譯介〉，《中國年鑑研究》，2019 第 3 期，頁 29-42。

<sup>58</sup> Andrea Bréard,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odernity: Essays on the Global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Numbers in China*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第 7、8、9 章。亦可參見白氏其他論文：“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0:3 (Jul., 2006), pp. 605-629; “Translating Statistics into 20th Century China: A Glimpse on Early Institutions and Manuals,” *Electronic Journal for History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2 (Dec., 2006), pp. 1-28; 王幼軍、白安雅（Andrea Bréard），〈統計學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從社會統計到數理統計〉，《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61-67、轉頁 74。

社會統計和數理統計的轉換，不只牽涉方法論，更多是環繞著人是否能同時掌握及推估自然與人文現象的理性秩序，這個認識論層次的問題繼而深刻影響國家該如何設計獲取及管理地方資源的合理統治機制。近年，Arunabh Ghosh 的專著《數字如何生效：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計學和國家治理》（*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就是探究統計知識與共產政權的複雜關係。該書在中國先後與蘇聯交好、破裂，繼而轉向與印度建立良好學術互動關係的國際背景下，描寫共產政府如何在 1949 年後，通過重建一套由中央貫達至地方的調查和統計官僚制度，使其搜集來的各項「事實」能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型態。為達成此目標，政府必須重造一套知識體系和統治技術。最重要的是，在蘇聯統計和社會科學觀念引導下，政府放棄了流行於民國時期以機率與概算為基礎的數理統計，轉向以全面普查為唯一形式、方法的社會統計。數理與社會統計在認識論層次大相逕庭，前者認為人可循機率概念掌握自然與人文世界的規律，後者則將兩者區分開來，專究人類世界；在不能容忍機率、偶然與混亂情況下，中共政權更否定平均數、中位數這類違反階級性質的數學理論，企圖以全國普查方式徹底掌握社會各方事實。而為全盤掌控國土資訊所建構的統治體系，除發展出愈漸膨脹的組織和人員外，還製造了雪崩般的調查文本和數字資訊。最終，在中蘇關係破裂轉向與印度友好之際，政府才重拾數理統計，著力於思索如何在社會裡挑選「又紅又專」的典型取樣代表。<sup>59</sup>這個研究案例描寫二十世紀中國的數字政治，討論國家如何在國內、國際政治文化影響下展開計政體系的建構工程。而針對 1949 年後中央統計制度建構的討論，也反映出像早期經濟學者李卓敏（1912-1991）在《共產中國的統計制度》對國民政府計政制度所下的較低評價。最主要因素

---

<sup>59</sup>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來自於，民國時期的政府體制建構未全，無法建立統一規劃、管理和觸及全國各地之統治制度；如縣級組織的統計工作就未能完全建制。<sup>60</sup>

近代中國的「社會」是個亟待重新定義和構劃的領域。哪股力量，以何種方式介入規劃，地方產生何種反應，這些皆不失為觀察「社會」如何被時人想像及建構的途徑，並可由地方抗拒國家滲入所採行的行爲，揣想「社會」組織、網絡在日常運作的邏輯與型態。作為現代性象徵之社會領域的誕生，更意謂了個人在國家內部的日常生活模式，會遭遇到不同層面和程度之力量的改變，進而成爲我們現在熟知的現代生活。能實踐這般轉變者，就是廣義的社會知識，如本節提到心理學、社會學、社會調查和統計學，重新界定了社會領域各部門的範圍和內涵，創造許多硬性標準、原則，深遠改變了舊有的生活方式。然而，這些現代科學治理政策，也非全無阻滯地在地方社會推展。早前，人類學者 James Scott 描述社會科學可視化及簡單化（simplification）力量和地區人民仰賴日常經驗、親身力爲所積累之實踐知識（metis），兩者在國家重塑社會時的遭遇和對抗。汪正晟討論中央政治學校在中國推動科學化治理技術，雖可能劇烈改變人們認知框架，卻也無力全盤扭轉現代中國的現實困境。<sup>61</sup>然而，或許就是這些衝突，更能凸顯地方社會運作的機制和實情。

東西方歷史場景，揭櫫了科學理性的知識實踐在重新構劃社會領域時可能遭遇到的挑戰。也進一步說明了，在國家與社會互動視野下，「社會」並非單向地接受國家治理力量，地方自有各種早存的應對方式。「社會」並非中性、透明的實存領域，而是在各種力量的干預、介入中誕生；過程中也影響了「個

---

<sup>60</sup> Li Choh-M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pp. 1-6. 最近一本碩士論文從教育統計面向描述民國政府欲建構這種現代量化管理官僚體系的困難。作者指出，教育統計方式雖然逐漸趨向科學化，政府隨之擴充官僚組織，掌握更多數字，卻可能離教育環境之「事實」，益加遙遠。許瑛芸，〈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7月）。

<sup>61</sup>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汪正晟，〈中央政治學校公共行政教育的困境與出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2（2018年12月），頁 37-82。

人」領域的界定。上述研究揭示了，「社會」和「個人」兩個領域在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形構下，愈顯明確；然而，「個人」做為成就「社會」秩序、律則的方法和目標，似乎也愈漸鮮明。有研究者指出，現代國家在調查與統計人民各項資料時，通過各種報告製作、公布與流通這些具有高度同質性的行為及程序，結合文本整齊劃一的標準和物理形式，將分散全國各區的事實凝聚在一起。此舉確實得以凝塑人們強烈的集體、認同感。<sup>62</sup>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這些以「社會」為名的知識與技術，究竟是打造出與國家相對抗的「社會」領域或公共性力量，還是一個以國家為最終目標導向的「社會」領域？近代中國的例子仍有待思考。

## 五、結論：近代中國的「社會科學知識時刻」

「社會」確實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的關鍵詞。1915年初，梁啟超就曾明白指出「政治之基礎恆在社會」，過往政治改革失敗的原因在於忽略了「社會」，知識人只顧好發「政譚」，沒有在社會領域提出實際作為。<sup>63</sup>當「政譚」被視為無效的行動，就意謂知識人得尋找另種實踐。任公一席話點出「社會」這個新領域形成的必要條件：另種型態的知識實踐者。楊念群就以這段資料帶出思想社群代際轉換現象。這意指一批留學歐美、具備專業學科知識的新型社群出現，能擇定具體、個別課題為文作論，而非前代知識人偏向採文化相對主義角度，較寬泛地思考、解決大問題。<sup>64</sup>這樣來看，「社會」其實是在知識內涵、

<sup>62</sup> Emmanuel Didier 討論美國計政體系，描寫經濟大蕭條時期，國家統計制度如何搜集與整合全國各地農產經濟狀況諸項資料、數據，而關於美國國家統合的形象與認同，就會經由繁複的調查與統計工作彰顯出來。Emmanuel Didier, *America by the Numbers: Quantif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Birth of National Statistics*, trans. Priya Vari Sen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20). 請見本書第一章。

<sup>63</sup> 梁啟超，〈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集9，頁170-172。

<sup>64</sup>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頁20-21。不過，當時仍有個人或社群是將社會科學知識當成可以統括解決現實生活所有問題的信仰、主義。請見：王

社群、實踐方法以及社會和文化條件轉型期間，被構作出來的新問題領域。透過新語彙和概念、現代學院及學科體制、專業知識社群與實踐，共同以新型知識、技術耕耘在這片名為「社會」的領地。這些相應於「社會」領域生成的知識實踐，就是環繞著「如何重造中國內部結構、組織以形塑新秩序」此一關鍵問題所展現的，在中國知識轉型時期的特定歷史性行動。

當我們將知識視為特定歷史性行動，循其線索來重探特定時空環境，就不會僅看到學科、學術機構和菁英分子。過往慣以「西學東漸」為探究近代中國知識史議題的切入點，以「知識轉型」和「學科史」兩條軸線理解從「舊學」到「新知」的過程。然而，這兩條線索還不足以盡述這段變化。相較之下，西方知識史立論有比較複雜的學術傳統，包含知識社會學、科學史和思想史、社會文化史四領域的交互論辯，所以較能深刻思考「知識」的定義、內涵、範疇，由此界立研究範圍以形塑較明確且具延展性的取徑。<sup>65</sup>循此，本文設計「詞彙概念史」、「知識轉型和學科史」、「知識實踐 / 支配世界的歷史」來描寫與評估晚近關於「社會」領域的研究狀況。必須說明的是，原先這三塊範疇的研究並非意在討論「社會」的問題，這是筆者為思考將知識實踐作為聯繫、統合特定時空環境片段，藉以從社會科學知識脈絡來描寫與評估「社會」領域特質的嘗試。而本文描述近代中國知識發展的歷史，更足以說明作為歐洲現代性經驗的「社會」在東亞區域發生的移轉與再製，實與社會科學在傳統知識領域觸發的變遷，密切相連。

---

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129-148。

<sup>65</sup> 歐美學界關於知識史的定義、討論和反省，在 2020 年前後出現較為顯著的進展，創立特定機構與期刊，持續推進相關議題。此處無法全面回顧這段過程，只能從其發展歷程所透露關於學術立場、傳統與論辯，凸顯中國知識史研究的現況及差異。相關研究請見：Lorraine Dast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1:1 (Spr. 2017), pp. 131-154. Suzanne Marchand, "How Much Knowledge is Worth Knowing? A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s Thoughts on the *Geschichte des Wissens*," *Ber. Wissenschaftsgesch.*, vol. 42 (Aug. 2019), pp. 126-149. 還有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與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此二定期出版知識史研究的刊物值得注意。

本文試圖指出，近代中國「社會」領域的形成及發展，是環繞著「社會秩序如何可能」這個社會科學知識脈絡的核心提問，揭橥了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對個人自由意志、行為與集體秩序關聯的思考，並試圖以科學研究來掌控、推估可能的群體秩序。語詞、概念層面經驗展顯的是：「理想群體秩序型態」問題在思想轉型時期如何被討論、思考，中西文化如何競爭與互動。學科面向則凸顯出「群體秩序問題」如何與科際界線的劃定相互影響。最終，要達致所謂「理想群體秩序」，還必須根據實證資料來掌握並預測方向，甚至可與域外他國作比較。也因為這樣，「社會」容易成為政府機關由上而下設計，切實掌握運作過程和可能結果的領域。但同時，「社會」也展現了一股由下而上，由知識分子調查與設計，和地方民眾共同構作以再造國家的公共性力量。知識實踐史的角度，提供研究者觀察「社會」領域如何在政府機關和人民，於不同政治、思想文化、知識傾向社群間被描述、評估和預測，甚而成為彼此交鋒的武器。一如社會調查派和社區研究的論辯；陳翰笙企圖和不同政治文化傾向者透過實質調查來對話；以及社會經濟史論戰中環繞著社會性質展開的多方論辯，「社會」的實然面貌從來都不只是目的，還成為論辯工具。但也因為目的和工具的混淆，導致民國以降環繞著「社會秩序掌控和推估」的討論，總是將應然和實然層面交織在一起。若得進一步分析不同知識社群的各種實踐，以及政府端和人民端的相互角力中，實然和應然、目的和工具交織混雜的情況，知識史層面呈顯的「社會」領域，還可能是我們理解中國內部不同板塊互動、競爭並推動現代轉型進程的中介層。

作為特定歷史性行動的知識，更可視為理解歷史世界的統合性取徑。近有歐洲、文化史家 Helge Jordheim 和 David Gary Shaw 提出「知識時刻」(knowledge moment) 概念，來操作以「知識」作為整體觀察與描寫歷史場景的作法。這是論者在思考知識史取徑和思想史或科學史之差異，藉採波寇克(J. G. A. Pocock)「馬基維利時刻」(Machiavellian moment) 提出的嘗試性想法。論者認為，研究者應該試著標誌出特定的「知識時刻」，將學院 / 知識場域 /

政治、社會場域裡幾段歷史進程結合在一起，觀察知識如何在特定歷史時刻爲了回應某個主要課題，從而建構了基礎的論述結構、內容與方式。也就是說，採行「知識時刻」的角度，可將知識視爲推動進程的主角，總合歷史事件和政治、社會和文化世界的變動，以此將學院內外的變化涵括起來考慮。<sup>66</sup>由此可以深刻理解，新知識觸發的認識論變革如何可能大幅影響現實世界。以此而論，自十九世紀晚期中國開始通過日本接納西方社會科學知識開始，到二十世紀創建現代大學專業科系，直至 1952 年中共施行院系調整爲止，或可嘗試將這段時期訂爲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時刻」。在這個時間段落裡，中國傳統知識結構、內容和表現方式乃至於知識論層次，都在遭遇社會科學後發生大幅度改變，這些變化亦和重大政治、社會事件，如立憲改革、革命、社會調查、地方實驗縣、社會史、經濟史論戰……等交織在一起，牽涉多種層次歷史經驗，從中顯現近代中國的「社會」領域。

在這個「社會科學時刻」下，我們還得注意知識史研究中的「無知」(ignorance) 問題。知識轉型是一個複雜工程，除傳遞和轉變上可能的時間差距、遲滯外，知識留存、缺漏和無知的問題也同樣重要。事實上，知識永遠和無知的情狀共存，所有知識追求、生產的起點，其實都與多面向的「未知」交纏在一起。只有在通過有目的地設法克服某種「未知」，人們才可能抓住知識的任何一個小部分。也就是說，人們「未知」和「已知」的景觀是共享相同基礎，我們很難拋棄「無知的歷史」去概念化描述知識歷史的進程。<sup>67</sup>從此角度出發，知識發展、轉型的歷史就不再是那種知識建構的直線、理性化過程，而是轉向可能和相對性充盈的場景。

例如，討論調查和統計所產出的事實和數字，就得注意「已知」和「未知」共存的問題。是時，不少人開始主張數字的重要性，著手搜集與建置。如傅斯

---

<sup>66</sup> Helge Jordheim and David Gary Shaw,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pp. 4-5.

<sup>67</sup> Vera Keller, "Into the Unknown: Clues, Hints, and Project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p. 87.

年（1896-1950）認為統計學能扭轉傳統人文學模糊的習慣，還曾開設過「統計學導論」。<sup>68</sup>史語所檔案也有他籌建「統計工作室」與延攬吳定良（1893-1969）的計畫，意在補足當時中研院社會科學所欠缺的「科學工作」。<sup>69</sup>時任工商總長的劉揆一（1878-1950）也曾特別說到「當先設工商業統計局，將全國之營業狀況、資本數額、職業類別，一一為數理之觀察」。<sup>70</sup>陶孟和也提到，討論社會問題的要件應該要是可用來做分析、計算、研究的「事實」。<sup>71</sup>數字與事實如何被部分知識精英強調，可見一斑。但當南開經濟研究所的何廉（1895-1975）進入工廠操作調查時，卻發現這些工人無法以數字很精確地回答資本額、薪水、工時等問題，缺乏數字概念的他們僅能以「很多」、「很少」、「很常」來回應。<sup>72</sup>顯然，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描述一個調查與統計知識普及、人人均具備量化思維的場景。這裡頭有許多新知識傳播遲滯的現象，引發已能掌握數字、事實概念者與未知者交織互動的故事，值得論者在發掘現代知識和社會建構過程中進一步深究。

總結來說，「社會」確實是個逐漸浮現於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國史脈絡中的新領域。它表現在人們操作新式政治語言去擊劃人類社群理想狀態的概念上，也表現在新興知識體系和學術機構裡，還體現於各種針對國家內部攸關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秩序的安排與規制中；它更是在現代民族國家依據這類知識制定之統治思想和實際舉措中，也在政策施行於中國各個角落時遭遇的不同經驗脈絡裡。綜言之，近代中國「社會」是結合語言概念、學科體制以及智識實踐三種交織著抽象和具象經驗的複雜領域，也標誌了二十世紀中國因轉

<sup>68</sup>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491。

<sup>69</sup> 〈廿二年三月五日院務會議記錄一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檔號：元513-9。〈本所呈蔡元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檔號：元513-19。

<sup>70</sup> 劉揆一，〈工商部長劉揆一之工商政策〉，《時事新報》，1913年4月23日，第3張第3版。

<sup>71</sup> 陶孟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名詞與單位問題〉，《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卷1號3（1930年9月），頁497-498。

<sup>72</sup> 何廉著，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頁74。

向現代社會科學而逐漸形成的新興「知識文化」(knowledge culture)光譜。<sup>73</sup>這些變遷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東亞各國在接納、傳遞和反饋歐陸思想文化的總體特徵。這些互異的知識實踐共同打造了近代中國「社會」領域，同時也在日本、韓國、臺灣甚至東南半島國家，創造另種想像和構劃國家組織型態、社群分類及總體秩序安排的思想與方法，創構獨屬該國脈絡的「社會」領域。<sup>74</sup>也就是說，那些國家也經歷如歐陸、近代中國的劇烈變化，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和比較。

---

<sup>73</sup> 「知識文化」概念強調歷史時間維度之於特定知識型態以及認識論形成的作用。本文引自：Margaret R. Somers, “Where Is Sociology after the Historic Turn? Knowledge Cultures, Narrativity, 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ies,”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54-55, 63-66.

<sup>74</sup> 「社會」領域在韓國、東南半島的問題，請見這部全球概念史的研究：Hagen Schulz-Forberg, ed., *A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of Asia, 1860-194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報刊

- 〈廿二年三月五日院務會議記錄一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檔號：元 513-9。
- 〈本所呈蔡元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檔號：元 513-19。
- 王楛主編，《嚴復集》，冊 1，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何廉著，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 林耀華，《林耀華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收入《民國叢書》，編 3 冊 17，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影印 1933 年星雲堂書店版。
- 李劍華，《社會學史綱》，上海：世界書局，1928。
-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收入《孫本文文集》，卷 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集 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費孝通，《費孝通全集》，卷 8（1957-1980），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清議報》（東京），1900。
- 《洞庭波》（東京），1906。
- 《浙江潮》（東京），1903。
- 《新青年》（北京），1918。
- 《時事新報》（上海），1913。
- 《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武昌），1930。

### 二、專著

- 《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学知》，卷 1-8，東京：岩波書店，2006。
- 水延凱主編、江立華副主編，《中國社會調查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
- 王文基、巫毓荃編，《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 王德發，《中華民國統計史（1912-1949）》，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
-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 宋怡明（Michael Szonyi）著，鐘逸明譯，李仁淵審訂，《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1。

- 李志英、羅豔、傅弈群，《認知中國：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的人群聚類分析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李培林、孫立平、王銘銘等著，《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社會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0。
- 李惠村、莫日達，《中國統計史》，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
-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 / 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譯，《學科·知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
- 馬亮寬、馬曉雪、劉春強，《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勞埃德 (G. E. R. Lloyd) 著，陳恆、洪慶明、屈伯文譯，《形成中的學科：對精英、學問與創新的跨文化研究》，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程美寶，《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北京：中華書局，2019。
- 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楊雅彬，《中國社會學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
-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
- 潘光哲，《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 韓承樺，《審重咨學：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
- 韓明漢，《中國社會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 Bréard, Andrea.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odernity: Essays on the Global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Numbers in China*.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 Bulmer, Martin,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urke, Pet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 K.; Malden, M. A.: Polity Press, 2016.
- Chiang, Yung-Ch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hiang, Howard, ed. *The Making of Human Science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9.

- Didier, Emmanuel, *America by the Numbers: Quantif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Birth of National Statistics*. Translated by Priya Vari Sen.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20.
- Dirlik, Arif, Guannan Li, and Hsiao-pei Yen, eds.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ndigen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Furner, Mary O. *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1865-1905*.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 Ghosh, Arunab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New Jersey;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Greenwald, Maurine Weiner, and Margo Anderson, eds. *Pittsburgh Surveye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acking, Ian.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am, Tong.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Li, Choh-M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 Makeham, John, ed. *Learning to Emulate the Wise: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Olson, Richar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642-1792*.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 Patriarca, Silvana. *Numbers and Nationhood: Writing Statis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orter, Theodore M.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oss, Doroth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chulz-Forberg, Hagen, ed. *A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of Asia, 1860-194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ooze, J. Adam. *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三、論文及專文

- 山室信一，〈日本帝國形成的學知與心性〉，《思想》，期 41，2020 年 11 月，頁 129-155。
- 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期 1，2011 年 12 月，頁 85-116。
- 木村直惠，〈《society》と出会う——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をめぐる歴史研究序説〉，《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9，2007 年 3 月，頁 1-31。
- 木村直惠，〈《society》を想像する——幕末維新时期洋学者たちと〈社会〉概念〉，《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1，2009 年 3 月，頁 1-53。
- 木村直惠，〈明六社「ソサイチー」・社交・アソシエーション実践：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の歴史的考察（前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5，2013 年 3 月，頁 1-33。
- 木村直惠，〈〈ソサエチー〉を結ぶ：明六社「ソサイチー」・社交・アソシエーション実践（後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6，2014 年 3 月，頁 1-37。
- 木村直惠，〈《社会》が生まれ、〈ソサエチー〉が消える：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と公共圏の構造（前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19，2017 年 3 月，頁 53-78。
- 木村直惠，〈〈社会〉が生まれ、〈ソサエチー〉が消える：明治期における「社会」概念編成と公共圏の構造（中編）〉，《學習院女子大学紀要》，号 20，2018 年 3 月，頁 29-60。
- 木村直惠著，顧長江譯，〈「社會」概念翻譯始末：明治日本的社會概念與社會想像〉，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 2，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131-145。
- 王文基，〈「當下爲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新史學》，卷 17 期 1，2006 年 3 月，頁 91-142。
- 王文基，〈心理的「下層工作」：《西風》與 1930-1940 年代大眾心理衛生論述〉，《科技、醫療與社會》，期 13，2011 年 10 月，頁 15-88。
-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489-516。
-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113-164。
- 王幼軍、白安雅（Andrea Bréard），〈統計學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從社會統計到數理統計〉，《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61-67、轉頁 74。
- 朱英，〈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4 期，頁 176-185。
- 江勇振，〈評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9，2013 年 3 月，頁 173-199。
- 牟國義、沈萌激，〈《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鑑譯介〉，《中國年鑑研究》，2019 年第 3 期，2019，頁 29-42。

- 宋學勤，〈梁啟超與社會學〉，《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頁95-101。
- 李恭忠，〈近代中國「社會」概念的早期生成〉，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7，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63-87。
- 汪正晟，〈中央政治學校公共行政教育的困境與出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02，2018年12月，頁37-82。
- 車泰根，〈數：帝國的算數和近代世界〉，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2，頁237-251。
- 承紅磊，〈康有為與「社會」一詞的再使用〉，《東亞觀念史集刊》，期7，2014年12月，頁299-326。
-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175-220。
- 馬敏、陸漢文，〈民國時期政府統計工作與統計資料述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頁116-129、轉頁160。
- 許琮芸，〈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年7月。
- 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34，2019年12月，頁69-131。
- 陳建守，〈作為方法的概念：英語世界概念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175-205。
- 馮凱（Kai Vogelsang）著，朱聯璧譯，〈中國「社會」：一個擾人概念的歷史〉，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卷2，頁95-130。
- 黃克武，〈引言〉，收入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i-xi。
- 黃克武、韓承樞，〈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111-177。
- 韓承樞，〈評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新史學》，卷24期4，2013年12月，頁209-211。
- 韓承樞，〈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東亞觀念史集刊》，期13，2017年12月，頁341-393。
- Baker, Keith Michae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Notes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pp. 95-120.

- Barshay, Andrew E. "The Science of Modernity in a Disparate World."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07-412.
- Bréard, Andrea.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n Studies*, 40:3 (Jul., 2006), pp. 605-629.
- Bréard, Andrea. "Translating Statistics into 20th Century China: A Glimpse on Early Institutions and Manuals." *Electronic Journal for History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2 (Dec., 2006), pp. 1-28.
- Daston, Lorrain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1:1 (Spr. 2017), pp. 131-154.
- Jordheim, Helge and Shaw, David Gary.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Dec., 2020), pp. 3-18.
- Keller, Vera. "Into the Unknown: Clues, Hints, and Project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Dec., 2020), pp. 86-110.
- Koselleck, Reinhart. "'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In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55-275.
- Lässig, Simone.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vol. 59 (Fal. 2016), pp. 29-59.
- Marchand, Suzanne. "Ha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s Had its Da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1-152.
- Marchand, Suzanne. "How Much Knowledge is Worth Knowing? A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s Thoughts on the *Geschichte des Wissens*." *Ber. Wissenschaftsgesch.*, vol. 42 (Aug. 2019), pp. 126-149.
- Pankakoski, Timo Juhani. "From Historical Structures to Temporal Layers: Hans Freyer and Conceptu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9:1 (Mar., 2020), pp. 61-91.
- Porter, Theodore M. "Genres and Objects of Social Inqui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1890."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39.
- Ross, Dorothy.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5-237.
- Somers, Margaret R. "Where Is Sociology after the Historic Turn? Knowledge Cultures, Narrativity, 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ies."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53-90.

- Symposium: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III. *Modern China*, 19:2 (Apr. 1993).
- Tsin, Michael. “Rethinking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Jens Damm and Mechthild Leutner, eds., *China Networks, Berliner China-Hefte/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35 (2009), pp. 20-32.
- Wagner, Peter. “‘An Entirely New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of Volition, of Thought’: The Coming into Being and (Almost) Passing Away of ‘society’ as a Scientific Object.” In Lorraine Daston, ed.,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132-157.
- Wagner, Peter. “Certainty and Order, Liberty and Contingency: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as Empir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p. 241-263.
- Wittrock, Björn, Johan Heilbron and Lars Magnuss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In Johan Heilbron, Lars Magnusson, and Björn Wittrock, ed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onceptual Change in Context, 1750-1850*.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p. 1-34.

## Th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flections on the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Han Chenghua\*

### Abstract

The present review article revolves around three different knowledge practices in the “social” realm of modern China: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systems and corresponding fields,” and “the practice and impact of knowledge in everyday life.” These three correspond to the fields of lexical and conceptual history,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practices/control, respectively. By reviewing relevant important works in recent years, the aim is to delineate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urther consider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should one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hereby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realm as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in this way? Second,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an attempt is made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understandings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y connecting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s the core with relevant individual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in and outside academic fields in modern China. In fact, knowledge provides us with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actors and structures. Researchers should attempt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erspectives of analyzing historical phenomena through the lens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simply considering knowledge as a transparent and neutral object, describing its content and concepts or exploring its connot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epen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knowledge” and to further consider the intertwin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realm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societ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of knowledge, social surveys, statistics

---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